青年学者论坛

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之再鞫与定谳

陶　亮

[摘要] 百余年来，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难以定论的关键就在于忽视了作为整体运思的“两篇”与“两考”。目前尚无实质性证据表明《新学伪经考》成书早于《辟刘篇》，据新见廖平信函，《周礼删刘》曾与《知圣篇》一起被携带至粤，康氏得以了解“尊今抑古”之说全貌。嘉道间，学人以优劣判分今古，彼此并非截然对立。1888年，廖平由《续今古学考》分作“两篇”，首次在抑古与知圣之间构建起经义关联。1890年起，康有为循之作“两考”，力证黜伪是尊孔的必然前提。这种著述形式与思维逻辑是廖、康唯一完全相同之处，据之可定谳该公案。但并非意味着康氏存在抄袭之举，二人今古学体系全然不同，由此可略窥清末思想界的内在分裂。

[关键词] 廖平　康有为　羊城之会　抑古尊今　知识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6－0076－015

在梁启超、钱穆等“学史”著述之中，晚清学术思潮为今文学，虽立意不同，确也反映出经今文学在近人眼中已成为一个需要着重描述的现象。廖平与康有为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备受“立言者”关注。同宗今文的皮锡瑞就颇为留心廖、康异同，[①] 古文家章太炎亦曾提及二人之间的思想纠葛，[②]“五四”新文化人也极为留心这一老问题。[③]

廖、康之“学术公案”无疑是理解近代知识转型的“波澜处”，相关论辩已持续百余年。[④] 近年来，吴仰湘、张凯等通过细读史料、剖析思想而重建史实，颇有启发。[⑤]

既有研究提供了解决该公案的多种可能，但仍有尚待思考之处。其一，脱离廖、康交涉核心，仅探寻康有为早期思想中今文学的痕迹。其二，受困于廖、康自身，把某些共同的知识

[收稿日期] 2024－02－02
[作者简介] 陶亮（1994—　），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207，taoliang@stu. scu. edu. cn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17ZDA010）、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刘歆乐律学思想研究”（23CZX017）阶段性成果。

① 皮锡瑞：《皮锡瑞日记》第2册，吴仰湘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第587、705页。
② 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制言》第1期，1935年。
③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
④ 如民国时期钱穆、顾颉刚、蒙文通等对此都有论述。改革开放后，李耀仙、黄开国、房德邻、刘巍等亦有相关研究。参张凯：《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8页。
⑤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张凯：《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第53–71页。

背景化约为单线授受。其三，对于羊城之会诸多言说旨趣存在认知偏差。最为吃紧处在于，清中叶以来治学风气是“回到西汉”，重视今文经的文本复原，但具体到如何“尊今”，怎样“抑古”，却言人人殊。将廖平“两篇”与康有为“两考”进行比勘，结论一定是异同互见，无法准确定位其学术渊源。

为人所忽略的是，“两篇”与“两考”都是合而言之。在廖平处，则为“辟刘”“知圣”；在康有为处，便是“新学伪经”“孔子改制”。这种著述形式与言说逻辑本身就极不寻常。王汎森曾触及尊孔与疑古的内在联系，但似乎混淆了晚清学人以“优劣”与“是非”判分今古的区别。[①]刘巍虽认识到“辟刘”是“知圣”的必然前提，[②]却又强调二人孔子改制说的一致性，[③]仍未达一间。

在两汉和清代今文家心中，“抑古”与“尊今”之间并无如此强烈的逻辑关系，更不存在将周公、孔子敌对化的倾向。自廖、康以降，经今古文学才由分离渐趋对立，周、孔也无法共存，风气为之一转。鉴于此，本文拟在辨析廖平、康有为交涉史料的基础上，追溯嘉道间学人对于尊今、抑古关系的看法，探明廖平将“辟刘”视为“知圣”经义前提的意义，由此出发裁定这桩公案，并借以观照清季民国世运学风之流变。

一、拨云睹日：廖、康“交涉”史料辨正

文献不足征是目前关于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难以取得一致看法的根本原因。关键虽在于廖平《辟刘篇》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成稿先后，但实现突破的支点则是《周礼删刘》以及围绕光绪十六年（1890）初“羊城之会”诸多言说背后的真实意涵。

蒙文通曾说：“廖师闻康氏以《左氏》《周官》诸古经皆刘歆所伪作，信而用之，遂有《周礼删刘》。”[④]蒙氏此言有误，廖、康在《左传》今古真伪问题上从未达到过共识，而《周礼删刘》早在二人会面前就已成稿。新见赵风昌藏廖平函札三通，约为同时所作，第三通涉及廖氏“二变”相关著述，尝谓：

> 昨得郑君手示，言师帅取阅《周礼删刘》。草本一册，当交来使送呈。至询寄还之处，则仍寄伍山长处可也。弟驳刘歆之书，尚有《辟刘》一篇，言其详悉终始，因涂抹太乱，未便上呈。俟还家后，重理清本，再寄陈，以博师座一噱。[⑤]

此函无明确时间，只书“廿九辰刻”，[⑥]联系后文“仓卒上船”“厚扰主人”之语，似应作于廖平由武汉出发之初。再结合第二札，言廖氏与宋育仁等奉张之洞命编《易经长编》与《左传长编》，略谓：

> 兹平有所拟《左传经例长编》一册，因春间奉师帅批定《左传凡例》……又，此次同来之宋、王二君……此次结伴同来一谒师门，一二日间当即乘轮赴宜矣。宋君明年考差，不能留

---

①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出版社，1987年，第74–111页。

② 刘巍：《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

③ 其实廖、康“孔子改制说”差异极大，完全是两种体系，限于篇幅与主题，此不赘。

④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清代汉学》，《学衡》第79期，1933年。

⑤ 廖平：《致赵凤昌函（三）》，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

⑥ 吴仰湘将此札系于光绪十五年正月廿九日，恐不确。参氏著：《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光绪十五年正月，廖平至粤。正月廿六日，张之洞招廖平等人饮于三君祠。二月初三，廖平与杨锐、王秉恩离粤入京。廖氏此函作于旅途中，万不可能是光绪十五年正月廿九日。参缪荃孙：《己丑日记》，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一》，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此。[1]

该信有两点十分关键。其一，据谭献《复堂日记》载，1890 年 3 月 26 日，张之洞在广州电召廖平编撰《左传凡例》，席间廖氏“谈《左氏》进退无据”。[2] 此函径言“春间”，则应与《左传凡例》作于同年。其二，考宋育仁生平，知其于 1891 年由翰林院检讨简放广西学政，任广西乡试副主考。[3]

据此可简单勾勒廖平行实。1890 年春，廖氏离粤入京参加殿试，夏秋至武汉，[4] 后于 1891 年 1 月 9 日夜抵家。[5] 可推测该函作于光绪十六年十月廿九日（1890 年 12 月 10 日），此时《周礼删刘》应较完善，否则也不会被张之洞取阅。但已是羊城之会后，该书会因康有为而修改吗？

从时间上来说，康有为 1889 年底返回广州，[6] 廖平 1890 年初入京参加殿试，二人会面大概在 1890 年 1、2 月。[7] 此后廖平舟车南北，大概率没有精力来修订、誊清能上呈乃师审阅的草本。更为可靠的证据来自廖氏尊经书院同学刘子雄的日记。光绪十三年（1887），刘氏曾批评《周礼删刘》“为阉割之法”，[8] 可见该书早在此时就已完稿。以往仅留意廖平是否向康有为出示过“两篇”，《周礼删刘》处于失语状态。原因在于 1897 年廖氏与宋育仁商定后，将该书删去刘歆窜改之说并附入《古学考》，便不再单独刊行。[9] 但在廖平“经学二变”初期，作为单行本的《周礼删刘》却充分反映了“抑古”的旨趣。

《辟刘篇》则较为复杂。考“言甚详悉”“未便上呈”之言，似乎书稿亦在行箧，只因涂抹太乱不便示人。吴仰湘在没有其他史料支撑的前提下，认为廖平“《辟刘篇》此时尚未写成清本，难以示人，更未随身携带”，强调其“手中绝无《辟刘篇》书稿可出示”，[10] 恐失之武断。刘子雄曾在 1887 年见过《辟刘篇》《知圣篇》的祖本《续今古学考》，[11] 而《知圣篇》在羊城之会前已经成书，那么《辟刘篇》则也应成稿。

综而论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在羊城之会时见过《知圣篇》，[12]《周礼删刘》也已成书，廖平大概率曾向康出示过。更审慎来看，《知圣篇》不仅谈改制，亦言古学“以伪作真”，[13] 廖氏尊今抑古的构思足以系统展现于康氏眼前。

然据《我史》载，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至八月，陈千秋、梁启超拜入康有为门下，分校《伪经考》，[14] 并于秋冬分两次送朱一新评阅。[15] 意即要到该年年底，朱氏才看到了《伪经考》的全稿，晚于羊城之会近一年。

吴仰湘力证《伪经考》“主体书稿”成于羊城之会前，关键证据是廖平为陆香初《目录学》

---

① 廖平：《致赵凤昌函（一）》，《赵凤昌藏札》第 5 册，第 444–445 页。

② 谭献：《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整理，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80 页。

③ 王东杰、陈阳编：《宋育仁年谱简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宋育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43 页。

④ 当年七月初四日，缪荃孙在日记中说：“莲生……招饮聚宝堂，廖季平……同席。”参氏著：《庚寅日记》，《缪荃孙全集·日记一》，第 131 页。

⑤ 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 年，第 46 页。

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8 页。

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17 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第 842 页。

⑧ 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59 页。

⑨ 吴福珩：《周礼纪闻序》，《廖平全集》第 16 册，第 1177 页。

⑩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⑪ 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第 41–42 页。

⑫ 顾颉刚曾在康家看到过《知圣篇》稿本，康有为在羊城之会时见过《知圣篇》已为学界公认。

⑬ 廖平：《知圣篇自序》，《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323 页。

⑭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 19 页。

⑮ 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 年第 1 期。

所撰之序。[1] 考廖序本意，是想由追忆二人定交引出对《伪经考》的评价，批评该书不出目录学之窠臼而非经学著述，几乎体现不出康氏携带此书会面的意思，目前并无实质性证据表明《伪经考》有主体、完稿之分。

羊城之会约五六年后，廖平撰《致某人书》，首次言及与康有为面谈之事：

> 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在吾子虽闻新有《左氏》之说，先入为主，以为万不相合，故从旧说而不用新义。[2]

张凯据此推断康有为新学伪经说已经形成，[3] 吴仰湘过于纠结此信衍生出来的“抄袭”说，[4] 皆忽视了其中充满张力的表述。此函讲述了廖平在光绪二十年（1894）从龙泽厚处获赠《新学伪经考》后致信康有为，回忆二人羊城会面之事。由于通信双方是公案当事人，非一家之言，若廖氏所言为虚，那么康氏万不能同意。[5] 廖平信中所言“虽未成书”指《左氏集解辨证》《五十凡驳证》等，[6] 本意在于强调“大端已定”，此时已主张《左传》为今学，[7] 与康有为完全不同，尝谓：“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谓好名，名已大立，当潜修，不可骛于驰逐。纯为儒者之言，深佩之。”[8] 而此语似乎和前面所言有所抵牾。康有为既然将《左传》视为王莽、刘歆伪书，为何又批评廖平“以攻新莽谓好名”？

需要指出的是，廖平与康有为在广州有过两次面谈。第一次是在广雅书局，康有为赞同《今古学考》的观点，批评廖氏借攻击刘歆以扬名。第二次则在安徽会馆，康有为却强调《左传》为刘歆伪造。若康氏曾向廖平出示过《伪经考》，只能是第二次见面，因为该书对歆、莽的批评比廖氏更甚。而两次会面不过逾月，若康氏一改前说，还出示《伪经考》，于情理万不能通。稍晚于《致某人书》的《经话甲编》（1897）亦云：

> 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9]

合而观之，廖平不仅谈论了如何“知圣”的问题，也表达了《周礼》《左传》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的意见。[10] 从康有为对待廖氏新说的表现来看，《新学伪经考》此时基本不可能成书。

但其中仍有未解之疑，康有为既肯定《今古学考》之说，批评廖平攻击歆、莽，又认为《左传》为刘歆伪窜，要如何认识这种充满矛盾性的叙述呢？实际上这正与《教学通义》相符，该书部分章节明显有《今古学考》的影子，但又强调《左氏》不传《春秋》，《周礼》为刘歆伪窜，应是受到常州学人的影响而来。[11]

至于康有为《我史》与廖平《经学四变记》等自述类史料，应多方参证，谨慎采信。如

---

①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② 廖平：《致某人书》，《廖平全集》第 11 册，第 663 页。

③ 参张凯：《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第 55 页。将《左传》视为刘歆伪窜者，刘逢禄早已言之，后龚自珍、魏源等申发此说，不能将道咸以来“今文家”共同的知识倾向视为康氏所独有。

④ 吴仰湘：《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⑤《致某人书》刊发于民国二年（1913）《四川国学杂志》第八号，此时康有为健在，廖平所言必不能为虚。

⑥ 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 3，《廖平全集》第 15 册，第 496 页。

⑦ 廖平：《〈左氏春秋考证〉辨正》，《廖平全集》第 9 册，第 2299−2300 页。

⑧ 廖平：《致某人书》，《廖平全集》第 11 册，第 663 页。

⑨ 廖平：《经话甲编》卷一，《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228 页。

⑩ 江瀚于 1888 年致信廖平，批评其攻驳《周礼》之说，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廖氏“尊今抑古”思想已经形成。参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中国学报》1912 年第 2 期。

⑪ 学界虽对《教学通义》的认识颇有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书体现出来的辨伪、改制都与“两考”完全不同。参傅凯瑄：《康有为〈教学通义〉撰作时间考辨——兼论其思想之转折》，《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88 期，2017 年。

1886年至1891年间《康有为日记》多与《我史》相异，康氏阅读兴趣偏于史学、理学、西学及时务，对于经学关注较少。其对历代典章制度与朱子、章学诚以及变法的重视恰与《教学通义》整体相符，从侧面反映出康有为此时并不留心经学的今古文问题。[①] 反观《刘子雄日记》，廖平在这几年间，时常思考《周礼》《左传》的今古真伪问题。二人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可视为"两篇"早于"两考"之旁证。

通过对廖、康交涉史料的重新辨析，可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最早见于羊城之会（1890）后，而廖平《知圣篇》《辟刘篇》《周礼删刘》三书草本则在光绪十四年（1888）已基本成书。这是后文讨论的基点。

二、古文借今文以明：嘉道以降"今文家"的抑古旨趣

廖平、康有为在面对他人非议其"尊今抑古"之时，自我陈词如出一辙，皆强调对嘉道学人的承袭。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对朱一新说，他之所以"能辨别今古"，是因为"读刘、陈、魏、邵诸儒书，因而推阐之"。[②] 光绪二十三年，廖平在致宋育仁的信中也写道："李申耆、龚定庵诸先达乃申今而抑古，则鄙人之说实因而非创也。"[③] 虽有辩解之意味，但二人所言未必为虚，如章太炎就观察到《新学伪经考》"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尤恣肆"。[④] 故而要想真切体认廖、康学术纠葛，便要跳出二人自身之藩篱，且进一步追索：在他们之前的"今文家"眼中，尊崇今文与贬抑古文之关系何在?

作为清代"刘歆问题"的始作俑者，[⑤] 刘逢禄的知圣路径反而与辨伪无涉，《左氏春秋考证》中有句话很值得玩味："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⑥] 刘氏此言隐含一个逻辑：只用《公羊》经义即可通晓《春秋》，强调"无《公羊》则无《春秋》"。[⑦]《左传》与《公羊》处于可供"知圣"选择的平行线，仅因为《公羊》优于《左传》，所以无须辨伪即能知圣。刘逢禄曾自述著作先后：始于《公羊释例》，复笺何休《公羊解诂》，再"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为《申何难郑》二卷"，[⑧] 最终"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⑨]

"辟刘歆之伪，以补任城何休之未备"则反映出了更为核心的辨伪缘由——"申何难郑"。刘逢禄强调"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刘歆等之附会，本在议而勿辨之科"，[⑩] 将今古真伪引入何、郑之争。这在《周礼》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刘氏虽贬低其为战国阴谋之书，但对真伪并不留心，多因郑玄引《周礼》证《左传》驳何休之说，才笼统批评《周礼》为刘歆所伪。[⑪]

① 张荣华整理：《康有为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119号，2009年，第32–55页。

② 康有为：《复朱一新》，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③ 廖平：《与宋芸子论学书》，《廖平全集》第11册，第659页。

④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

⑤ 郜积意：《刘歆与两汉今古文学之争》，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46–148页。蔡长林指出"常州之攻击刘歆者"始自庄述祖，参氏著：《常州庄氏学术新论》，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3–14页。无论"刘歆问题"起于何人，以优劣分今古的主张未变。

⑥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上，顾颉刚点校，朴社，1933年，第2页。

⑦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3《春秋论下》，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编第278册，赵伯雄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⑧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3《春秋公羊释例序》，《儒藏》精华编第278册，第110页。

⑨ 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3《左氏申膏肓》，曾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0页。

⑩ 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3《左氏申膏肓·叙》，第359页。

⑪ 可参刘逢禄对《春秋》"文公元年"之"公孙敖如齐"条的解读。氏著：《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3《左氏申膏肓》，第365页。

还要厘清的是，刘逢禄所知之“圣”为何？虽然两汉今文家提倡孔子为汉制法，但并不排斥文王、周公，孔子改制亦无须辟除“周道”。董仲舒曾云：“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圣，功莫大于此。周公，圣人也。”① 何休也认为周公“德至重，功至大”。② 刘逢禄则强调《春秋》“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③ 反复论说孔子与周道之联系。

根据艾尔曼的论断，明确将“今文经学研究与《周礼》辨伪史联系到一起考察”的是宋翔凤。④ 此论值得商榷。宋氏曾强调今文群经为备，不待古文而明，不大在意“抑古辨伪”，⑤ 并未武断地将《周礼》与《王制》的礼制差异认定为刘歆作伪，而是指责《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传承谱系不明。⑥ 宋翔凤指出，刘歆的问题在于判断错了《周礼》的制度年代，使得郑玄等人以《周礼》为周公制作，并以此证群经，⑦ 而纵使有伪造之处，也可通过《毛诗》筛选出来。⑧

此外，宋翔凤还认为“古今文说者各异，遂未必皆得其实，在读书者折其衷”，⑨ 强调“《毛诗》古文家别为一说。《诗》无达诂，自可并存”。⑩ 在他看来，今古各有优劣，可以《春秋》《论语》通达圣人“太平之治”而无关辨伪。⑪

钱穆指出从魏源开始，今古文经学之间渐成壁垒。⑫ 魏源也的确认为要“黜东晋梅赜之伪”才能“返于马、郑古文本”，再“辨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返归“伏生、欧阳、夏侯及马迁、孔安国问故之学”。⑬ 这一表述看似与廖平所言“辟刘”才能“知圣”的逻辑颇为相似，该如何理解呢？

《书古微序》略云：“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⑭ 魏源指出要想使《尚书》古谊复还，“则全赖有《史记》《汉书》及伏生《大传》残本、《汲冢周书》佚本三者为之命脉也”，⑮ 并希望通过三家《诗》匡正《毛诗》“滞例”，⑯ 使“齐、鲁、韩与毛并行，颁诸学宫”。⑰ 在魏源的预设中，颇有“以复古为解放”的意思，⑱ 尝谓：

> 于东京之学，盖尽心焉。求之西汉贾、董、匡、刘所述，七十弟子所道，源流本末，其尚尽合乎？其未尽合乎？有潜心大业之士……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⑲

此言颇有“渐进式”之意涵，要通过尽心求索东汉之学才能达致西汉，再探求西汉之学方能通晓先秦七十子之说。而廖平则是绝对激进的逻辑思维，在他看来不存在东汉古文学，也不

---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17 页。
②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上，吴迎龙整理，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354 页。
③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 4《释三科例中》，《儒藏》精华编第 278 册，第 116 页。
④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9 页。
⑤ 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 1《拟太常博士答刘歆书》，《儒藏》精华编第 278 册，第 419-420 页。
⑥ 宋翔凤：《论语说义》，杨希校注，华夏出版社，2018 年，第 7-8 页。
⑦ 这正是宋翔凤关于今文经学“知圣”与“改制”看法的隐微之处。参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82 页。
⑧ 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 1《答包慎伯书》，《儒藏》精华编第 278 册，第 421 页。
⑨ 宋翔凤：《过庭录》卷 5《周公摄政》，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1 页。
⑩ 宋翔凤：《过庭录》卷 7《驺虞》，第 124 页。
⑪ 宋翔凤：《论语说义·序》，第 1 页。
⑫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17 册，第 685 页。
⑬ 魏源：《书古微例言上》，《魏源全集》第 12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11-112 页。
⑭ 魏源：《书古微序》，《魏源全集》第 2 册，第 1 页。
⑮ 魏源：《书古微例言下》，《魏源全集》第 12 册，第 115 页。
⑯ 魏源：《诗古微序》，《魏源全集》第 1 册，第 99 页。
⑰ 魏源：《诗古微目录书后》，《魏源全集》第 1 册，第 736 页。
⑱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72-173 页
⑲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全集》第 12 册，第 726 页。

需要通过“复古”求解放。廖平主张“解放才能复古”，先“辟刘辨伪”才能“尊今知圣”；魏源则以东汉古文追溯西汉今文，其间根源在于“优劣”而不关“是非”。此外，魏氏尤尊周公，视其为先圣，[①] 还认为《周礼》及《诗经》雅、颂皆为周公所作。[②]

最后还可探讨一下嘉道间其他士人的观点。陈寿祺曾说：“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所无辄废古。”[③] 龚自珍主张六经为“周史之大宗”，要“阶孔子之道求周道”，[④] 指出《左传》虽为刘歆所伪，[⑤] 但不影响该书为《春秋》之传。[⑥] 龚氏指出刘歆之误在于使《周礼》升格，造成“经”与“群书”错位，所以知圣的前提是“正名六经”。[⑦] 邵懿辰虽认为《仪礼》十七篇经文皆孔子手定，却强调“亦本周公之意”，[⑧] 指出逸《礼》、逸《书》虽为刘歆所伪，但“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⑨] 反而担心“将有偏主今文学而概他经古文为伪者，势不至废经不止”，用意在于“维古文以维群经”。[⑩]

综而言之，“刘歆作伪问题”除刘逢禄之外，其实在廖平之前基本上是一股隐而不宣的伏流。就时人看来，是否符合西汉师说与家法才是尊今抑古的根本标准，钱玄同就指出常州学派“虽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⑪] 在廖平之前的大部分士人眼中，虽然关于如何“知圣”的主张千差万别，但共同的知识倾向则是预设西汉典籍与今文经说的优越性，将其视为判断刘歆是否作伪的标准，以此弥缝两汉今、古之间的义理鸿沟，从而达致周、孔之道。庄存与族侄孙庄有可说：“非今文因古文以重，实古文借今文以明。”[⑫] 这应该是最为贴切的描述了。

三、排周公以扬孔子：廖平“尊今抑古”中的经义割裂

在廖平经学构建中，《今古学考》实质上更像是一部铺垫性著作，既是撰作古义新疏的理论宗旨，更是“两篇”的思想先声。可以刘子雄的观察大致勾勒廖平由“平分今古”转向“尊今抑古”的学思历程。（参见表 1）

表 1　光绪十三年廖平“尊今抑古”历程表

日期	事件
四月十一日	疑《周礼》当以王莽制参考
六月	成《王制周礼凡例》《周礼删刘》八证，以《周礼》为刘歆伪作
八月	成《续今古学考》，强调周制皆不可考，均为孔子改制之说
九月初十日	指出《左氏》作伪之迹甚悉

资料来源：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第 41–43 页；廖平：《知圣篇》，《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359 页。《刘子雄日记》今不可见，引自其它文献中残存之言说。

① 魏源：《周公从祀学校议》，《魏源全集》第 12 册，第 139–140 页。
② 魏源：《诗古微上编之六 · 通论三颂》，《魏源全集》第 1 册，第 307–308 页。
③ 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自序》，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第 2–3 页。
④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年，第 21–25 页。
⑤ 龚自珍曾作《左氏决疣》辨刘歆之伪。参氏著：《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 514 页。
⑥ 龚自珍：《春秋决事比自序》，《龚自珍全集》，第 234 页。
⑦ 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五》，《龚自珍全集》，第 40 页。
⑧ 邵懿辰：《礼经通论 · 论孔子定礼十七篇亦本周公之意》，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第 9–11 页。邵氏重视《仪礼》似乎与朱子有关，颇有宋学意涵。
⑨ 邵懿辰：《礼经通论 · 论逸礼三十九篇不足信》，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第 16 页。邵氏对于廖、康的启发无关判分今古，而是“礼经为备”之说。
⑩ 胡玉缙：《尚书传授同异考叙》，邵懿辰：《尚书传授同异考》，民国十八年（1929）仁和邵氏家祠刻本，第 3–4 页。
⑪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钱玄同文集》第 4 卷，第 225 页。
⑫ 汤志钧：《庄存与年谱》，台湾书局，2000 年，第 31 页。

由上表可见，廖平思考真伪的核心在于《周礼》，而在羊城之会前《续今古学考》与《周礼删刘》就已成书。廖氏曾自述“经学二变”之因：

> 两汉之学，《今古学考》详矣……惟一经之中，既有孔子、周公两主人，典礼又彼此矛盾……于是考究古文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①

廖平认为将《王制》与《周礼》分属孔子、周公的做法有割裂六经之嫌。光绪十四年（1888），廖氏致信岳森，谓：“《学考》以《王制》为今学主，《续考》以六经皆为孔子翻定，古学始于刘歆。但得申此三语，则高光重兴、羲辔复旦。”② 作于同年的《知圣篇自序》亦云“自微言绝息，异端蜂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③ 再《经话甲编》载：“丁亥（1887）作《［续］今古学考》，戊子（1888）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④

由此可知，1887年廖平将《今古学考》改作《续今古学考》后，次年再将《续今古学考》分作《辟刘篇》《知圣篇》。从文本来源看，“两篇”成稿时间应大致相同，“辟刘”“知圣”是须臾不可离的整体构想。

《周礼删刘》大致能反映羊城之会前廖氏经学二变的原貌，⑤ 他指出刘歆本《佚礼》伪窜《周礼》，则“删去伪羼之条”方能还原本之旧。⑥ 廖平虽然提到今古优劣之说，但又认为《左传》与《周礼》“是非不待言”，⑦ 强调“古学日兴”则“今学浸以微亡”。⑧ 而刘逢禄却说“其伪者文，虽比于经，断不足以乱经之义例”，⑨ 二者之异显然可见。《周礼删刘》与《知圣篇》正表达出廖氏“尊今抑古”的系统运思，《古学考》也基本延续《删刘》之说。

廖平曾和宋育仁提到：“及同讲习四五年之久，知古派始于刘歆，由是改作《古学考》，专明今学。”⑩《古学考》自序云：“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⑪ 循此可推出以下逻辑：既考古学之伪便明今学之真，“辟刘”方能“知圣”。《知圣篇》又云：“今欲删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见本来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则晚说自不能惑之矣。”⑫ 廖氏此言很有些道咸之际今文家的意味。且再看《古学考》的记载：

> 天下之事，是非不能两立，而刘歆伪说乃与孔子六经并立千余年，人不能正其非。虽攻《周礼》者代不乏人，然由于今学未深，不能心知乎真，何能力辨乎伪。……诚于今学多一分功夫，则古学多露一分破绽。今学大明，则古学不攻自破。惟流误已久，若不辟之，恐不明白。⑬

廖平虽强调今学大明则古学不攻自破，其后却下一转语：正是因为经学受到刘歆之乱已历千载，如果不先行辟除伪说，恐怕后世之人不明真相。廖氏以“是非”断定“今古”，必然要先驳倒古文经学，才能显明今文经学，这是一种极为激进且互相对立的今古文经学观。在廖平的思维结构中，“辟刘”一定是“知圣”的前提，真正动因则关系周、孔之升陟。就以往经学家看来，周公、孔子从来就不仅代表古文与今文，纵然其地位有别，但背后指涉的是一以贯之的

---

① 廖平：《四译馆经学四变记》，《廖平全集》第2册，第886页。
② 岳森：《南学报廖季平第三书》，《癸甲襄校录》卷5，光绪廿年甲午尊经书局刻本，第69页。
③ 廖平：《知圣篇自序》，《廖平全集》第1册，第323页。
④ 廖平：《经话甲编》卷3，《廖平全集》第1册，第278页。
⑤ 该书分“十二证目”，1894年均已完成，廖平于此年才从龙泽厚处得赠《伪经考》。
⑥ 廖平：《〈周礼删刘〉叙例》，《廖平全集》第1册，第143页。
⑦ 廖平：《〈周礼删刘〉举例十二证目》，《廖平全集》第1册，第149页。
⑧ 廖平：《〈周礼删刘〉叙例》，《廖平全集》第1册，第148页。
⑨ 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3《左氏申膏肓》，第360页。
⑩ 廖平：《与宋芸子论学书》，《廖平全集》第11册，第659页。
⑪ 廖平：《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第105页。
⑫ 廖平：《知圣篇》，《廖平全集》第1册，第324-325页。
⑬ 廖平：《古学考》，《廖平全集》第1册，第124页。

“圣人之道”。[①] 而《古学考》却云：

> 六经传于孔子，实与周公无干。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刘歆《移书》亦全归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家说以经皆出周公是也。[②]

此言将刘歆、周公、古文经三者视为与孔子相敌对的伪说，首次将辨伪古文的核心由“刘歆问题”转变至“周公问题”。按照廖平的理解，周公没有制作六经，并非经学意义中的圣人，三代史事演变为纯粹之托言。《经话甲编》表达得更为详细：

> 西汉以前，言经学皆主孔子，不系于周公。汉明帝于学校并祀周孔。郑君以先圣为周公，先师为孔子。议者以周公为先圣作经，孔子为先师传经。此乃古学盛行之后，援周公以与孔子为敌。[③]

以传统儒家而论，周公地位之崇高在于制礼作乐，更多地指涉其事功，是作为三代之一的“周”而垂范万世。[④] 廖平则认为既然周公与群经无关，只有孔子才是六经的著作者，想要以此化解由于周、孔之分导致的六经割裂，却直接导向了周、孔对立。《知圣篇》尝谓：“以六经分属帝王、周公、史臣，则孔子遂流为传述家，不过如许、郑之比，何以宰我、子贡以为贤于尧舜。”[⑤] 廖平主张排周公以扬孔子是抑古的必然要求，强调六经皆为素王改制蓝图，从著作权层面发明经学“百世可知”之要义，并批评龚自珍“六经皆史”、魏源尊周公为先圣的观点为邪说，“皆与尊孔之旨相抵牾”。[⑥]

而来自“对手方”的意见或许更能理解廖平之说。章太炎曾指出，在廖氏的逻辑中，“古文逸经，多谓出于周公，是则六经为周、孔并制，孔子又不得为生民所未有也，于是谓逸经皆刘歆所伪撰，而孔子乃尊无二上矣”。[⑦] 所以“抑古”一定是“尊今”的前提，周、孔与古、今是一个整体构思。

再者，廖平将古今与周、孔激烈对立，主要是因为礼制的歧异，《周礼》取代《左传》成为抑古辨伪的核心。[⑧] 在历次的经今古文之争中，双方多聚焦于《春秋》学相关议题，论辩《左传》《公羊》孰优孰劣。廖平则明确表示“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⑨] 强调《诗经》《尚书》“推《周礼》以为说”，为误解经文之举，而郑玄更“多因强附《周礼》而误”。[⑩]

梁启超从学术谱系上指出康有为今文学出自廖平，强调二人差别在于“有意识之排古”与“无意识之学问”。[⑪] 但梁氏并不明晰廖、康之渊源究竟何在，康氏有意识之排古正由廖氏而来，“抑古”而“尊今”的逻辑链条正是廖平的“发明”。

综上所论，廖平“尊今抑古”的言说方式与经义逻辑本就具有一种对前代今文家的“反动”

---

① 钱穆说：“及于汉代诸儒，莫不重《春秋》。《春秋》，经世之书也，而尤必以《公羊》为大宗。后世治《公羊》之学者，亦必心仪有周公其人，与夫其及身之所创制，而后可以确然有会于当时《公羊》家之论旨之所终极，而确然见其有可以实措之于当时民物人生之大全也。”参氏著：《周公与中国文化》，《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18 册，第 158 页。

② 廖平：《古学考》，《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124 页。

③ 廖平：《经话甲编》卷 1，《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177–178 页。

④ 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就说：“经虽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经纶之迹，后世以是为学，岂不美哉！”参氏著：《教学通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8 页。

⑤ 廖平：《知圣篇》，《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324 页。

⑥ 廖平：《论立德立功与立言之分》，《廖平全集》第 11 册，第 763 页。

⑦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章太炎全集》第 10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02 页。

⑧ 皮迷迷认为“《周礼》既非真周公典礼，且与周公全无干系，则古学的基础就此瓦解”。参氏著：《被“建构”的今、古文经学及其意义——另一种看待廖平今、古学之辨的视角》，《哲学门》（总第 34 辑）第 17 卷第 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73–177 页。

⑨ 廖平：《古学考》，《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125 页。

⑩ 廖平：《知圣篇》，《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361–362 页。

⑪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3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2 页。

性质，通过辨伪将群经收归孔子，摒弃周公。而素王改制说的提出，更是否定了三代史事，强调六经皆为托言，从经史关系上区分周、孔，将二者关系敌对化。排周公从此成了扬孔子的逻辑前提，“尊今”必然“抑古”，此乃廖平今古学体系中最为隐秘的经义新造。

四、辨伪经而得真经：康有为“两考”的内在逻辑

如果承认康有为经学思想存在一种转向的话，那么契机何在？大概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既有研究多从《教学通义》说开去。梁氏提到该书为康氏“贯穴之著”，而“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① 大体指康有为由《教学通义》转向《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教学通义》的问题颇为复杂，但无论怎样，该书对抑古辨伪的关注十分有限，主张返归周、孔之道的前提是回到“治教合一”。据《我史》载，1886 年康有为撰《教学通义》，1888 年便“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② 虽有“倒填年月”之嫌，但从《教学通义》到“两考”之间确实发生了变化，而这正与廖平有关。③

首先须厘清的是康有为“两考”的内在联系。《新学伪经考》刊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康氏开宗明义，指出刘歆欲“夺孔子之经”而“托之古文以黜今学”，④ 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⑤ 故“刘歆之伪不黜”则“孔子之道不著”。⑥

所谓“孔子之道”即指“素王改制”，此为“新学伪经”说关怀所在。康有为在撰作《伪经考》期间，曾与朱一新往复论辩，双方信函留下了一些证据，《无邪堂答问》中也有不少关于孔子改制的相关言说。⑦ 康氏不断向朱氏强调自己“辟伪经”是为了“明孔子之政制”，⑧ 二者实为一体两面。当时有不少士人也认识到《新学伪经考》的多元面向，如李瀚章在回禀清廷《新学伪经考》案的奏折中即言：“其自序有‘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本意尊圣，乃至疑经，因并疑及传经诸儒。”⑨

1917 年，在《伪经考》初版刊刻二十多年后，康有为重刻该书，更加系统地强调道：“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俾学者明辨之，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⑩ 康氏的逻辑在于，首先排抑刘歆伪学，进而通晓《春秋》，方知孔子改制。⑪

复观《孔子改制考》，不少章节都有“辩详《伪经考》”的小注，可见二书之联系。康有为认为，《周礼》《汉志》所载儒家出于孔子之前是刘歆“乱教倒戈之邪说”，⑫ 尝谓：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272 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 16 页。

③ 皮迷迷：《从〈教学通义〉的内在困境看康有为的经学转向》，《哲学动态》2024 年第 4 期。

④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398 页。

⑤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379 页。

⑥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355 页。

⑦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朱一新全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9–45 页。参曹秀美：《朱一新与康有为——以经学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 28 期，2006 年。

⑧ 康有为：《复朱一新》，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 112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32 辑，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25 页。李瀚章奏折略本于李滋然之回禀而又有所不同。《伪经考》案发时，李瀚章在广东巡抚任上，李滋然候补电白知县，负责查办“康案”。参张鋆衡：（民国十七年）《长寿县志》卷 11《李滋然墓表并铭》，李鼎禧主编，余云化点校、注，方志出版社，2015 年，第 345–346 页。也可参吴仰湘：《〈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⑩ 康有为：《重刻伪经考后序》，《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80 页。

⑪《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云：“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参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 6 集，第 4 页。

⑫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 3 集，第 85 页。

> 自战国至后汉八百年间，天下学者无不以孔子为王者，靡有异论也。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传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于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只为师统而不为君统，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①

在康有为眼中，周、孔问题是“孔子改制说”的核心，必须要通过对刘歆所伪造古文经的否定才能为周公“祛魅”，这是确立孔子至圣的必要准备，也是孔教学说的经义前提。与此相关的是对《周礼》的辨伪，康有为指出该书乃是刘歆“移秦、汉为周制，微文琐义，无一条不与孔子真经为难”，② 强调刘歆之伪经“总集其成，则存《周官》”，③ 此说实与廖平相同。

简言之，“孔教问题”的论证必然要以对孔子的抬升与对周公的贬抑作为核心。在康有为的构想中，只有孔子才是万世大圣，他认为刘歆“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④ 则“中国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运，皆刘歆为之”。⑤ 在康氏看来，刘歆通过加强周公、老彭与六经的联系，篡夺了孔子“三世”说的正统地位，故“辟刘”一定是“改制”的第一站。

1897 年 9 月 26 日，梁启超在《知新报》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叙》，强调该书乃是康氏“演孔四书”之首，通过考辨伪经，确立孔子改制，最终达到“大同三世”。⑥1920 年，康有为在与李忠镐的信札中也谈到著述宗旨：

> 若不知古文《左传》之伪，则不知今文《公羊》之真，则孔子之大道终无由明……《伪经考》所以辨伪孔经之非而存其真，《论语注》所以考今文之说而存七十子之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则稍备孔子三世之学，庶几孔子之道不坠。⑦

该信更能突出康有为著述思想的体系性，《伪经考》是进入康学的钥匙，进而才能明了《改制考》《论语注》的经义关怀。茅海建就指出康氏“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只是考证过程，其结论应是“大同三世说”。⑧

无论康有为自己抑或时人的看法，《伪经考》就是为了证成孔子改制，二者存在紧密的经义联系。⑨ 这种著述形式与思维结构并非汉、宋经师的共同知识背景，而是专属于廖平“尊今抑古”的思想发明。1913 年，距离羊城之会二十余年之后，康有为致信廖平，首次回应了二人之交涉：

> 仆昔以端居暇日，偶读《史记》，至《河间献王传》，乃不称古文诸书，窃疑而怪之……乃遍考《史记》全书，竟无古文诸经；间著“古文”二字，行之不类，则误由刘歆之窜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为伪，即信今文之为真，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⑩

康氏声称《新学伪经考》主要以《史记》为判分今古真伪的标准，廖平的出发点则是《王制》，此言基本可信。但他又说“知古文为伪”便“信今文之真”，这分明就是廖平“经学二变”

---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 3 集，第 101 页。

②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438 页。

③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394 页。

④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 叙目》，《康有为全集》第 1 集，第 355 页。

⑤ 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 6 集，第 425 页。

⑥ 梁启超：《〈新学伪经考〉叙》，《梁启超全集》第 1 集，第 263 页。

⑦ 康有为：《复李忠镐》，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 173 页。

⑧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57–71 页。

⑨ 於梅舫意识到伪经说深层意涵是素王改制，但又强调康氏此举源自“朱子将〈四书〉别出于〈五经〉之外的办法”，实则朱子别出〈四书〉建立道统并不以对“五经”的排抑作为前提，不能忽视康、朱二人的逻辑差异。参氏著：《〈新学伪经考〉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5 期。

⑩ 康有为：《致廖平》，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 724 页。

的创造。康有为在羊城之会时倾向《今古学考》的主张，不太关注今古的真伪属性，[①] 只谈周、孔之分，上引言说应是康氏在羊城之会后才确立的观点。廖平曾云："《学考》今、古平重，则此说可存；若考其实，有今无古。"[②]《今古学考》与《知圣篇》无法共存，"两考"恰是从其中"解放"出来。

简言之，廖平将今古的关系由"优劣"转变为"是非"，其"排周公"以"扬孔子"的论说形式为康有为解决《教学通义》今与古、周与孔并存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是其转向"两考"的直接契机。

五、余论：晚清思想史"转捩之革命力量"

虽然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公案偏向私人性质，但透过其纠葛缠绕之处，恰可瞥见晚清经学演变中被遮蔽但又极其重要的一面：思维逻辑的转折。

在嘉道以降的经学世界中，尽管今文与古文之间具有某种"道一风同"的分立化特征，但基本不存在激进的对立化倾向，乃是基于西汉、东汉学术的优劣差异。周、孔地位纵然有别，但儒家之道一脉相承，要达致圣人之道，无须先辨伪古文，而是依据年代更为靠前也更优越的今文经说（多认为是《春秋》)。这也是羊城之会前康有为的大体认知，颇似廖平《今古学考》中周、孔共尊，今、古并举的主张。[③]

廖平"尊今抑古"之说最具冲击之处就在于提供了一种绝异于两汉及清代学人的思路，强调抑古辨伪是尊孔改制的绝对前提，消解了周公、孔子"一林二虎"的张力。新见史料表明，1890 年初羊城之会，康有为大概率阅读过《周礼删刘》与《知圣篇》稿本，得以了解廖平"辟刘""知圣"的构思全貌，循之撰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这也是廖、康真正完全一致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存在抄袭之举，二人短暂相会后数年未通音信，不可夸大廖平对于康氏经学观点的影响。他们更类似两心相协的学术同道，分别之后则迈向完全不同的"世界"。康有为构建起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大同三世的政教体系，比起廖平不断变化的思想，显然更广大精微。

正因此，今古之间转变成了不能共存的是非问题，孔子权威的确立缘于排抑古文与周公，颇有"道出于一"之感，但却从根本上转变了"见道"的方式。[④] 廖平可能无法预料，他在广州与康有为关于"辨伪"以"知圣"的言说逐渐被视为经学的常识，为本就不安定的清末社会埋下了思想分裂的内在伏笔。流风所及，近代政治文化中不破不立的激进主义，也与此关系颇大。[⑤]

进一层言之，在激变的近代中国，于"中西""新旧"之争外，经学内部的分裂如何导致了传统的转型？此动因又怎样成为无须探讨的常识，并改变了时人的治学倾向与思维方式？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在本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杨世文、夏明方、廖文辉、高龙、张行、余洋、吴艾坪、李沛姗、盛博言、沈烨琳、赵晨光等师友的批评指正，谨此致谢！）

---

① 刘咸炘就曾批评《今古学考》"未尝别真伪"。参廖平著，刘咸炘批注：《今古学考》，光绪丙戌《四译馆经学丛书》本，四川省图书馆藏，馆藏号：209，无页码。

② 廖平：《经话甲编》卷 1，《廖平全集》第 1 册，第 177 页。

③ 早在羊城之会前，康有为就在沈曾植处阅读过《今古学考》，且颇为倾心此说。参李详：《药裹慵谈》，李稚甫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00 页。

④ 康有为声称，读《新学伪经考》可别古今，分真伪，从此"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若指掌中"，再研习《公羊》，便"数日可通改制之大义"。参氏著：《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 2 集，第 19–20 页。

⑤ 侯堮：《廖季平先生评传》，《大公报 · 文学副刊》（天津），1932 年 8 月 1 日，第 8 版。

References

Fu Kai-hsuan. “Kang Youwei Jiaoxuetongyi zhuanzuo Shijian kaobian: Jianlun qi sixiang zhi zhuanzh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ates of Kang Youwei’s Jiaoxue Tongyi and on the Changes of his Thoughts). *Taida wenshizhe xuebao* (Humanitas Taiwanica) Vol. 88 (2017).

Mao Haijian. “*Wuxu shiqi Kangyouwei Liangqichao de sixiang*” (the thought of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in Wuxu period) ,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21.

Wang Fansen. “*Gushibian yundong de xingqi*” (The rise of the Ancient Historical Discrimination Movement). Taipei: Yunchen chubanshe, 1987.

Wu Yangxiang. “Chonglun Liaoping Kangyouwei xueshugongan” (A New Discussion of the’Case of disputed Schloarship’ Imvolving Liao Ping and KangYouwei). *Zhongguo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2020).

Zhang Kai. “*Jing jinguwen zhizheng yu jindai xueshu shanbian*” (The dispu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cal Texts and Modern academic Evolution). Chengdu: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2020.

A Reexamination and Final Judgement of the“Case of Disputed Scholarship” Involving Liao Ping and Kang Youwei

TAO 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ichuan University; taoliang@stu. scu. edu. cn)

Abstract: For over a century, the key to the unresolved academic controversy between Liao Ping and Kang Youwei lies in the oversight of the“two works” and“two examinations” as holistic considerations. Currently, there is no substantive evidence that the“Forged Classics of the New Learning” was written earlier than the“Refutation of Liu Xin” . According to newly discovered Liao Ping letters, “Zhou Li Shan Liu” was carried to Guangdong together with the“Recognizing the Sage”, and Kang wa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Respecting the Modern Classical Text and oppose the Ancient Classical Text“. Previously, Jia dao scholars judg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ancient times, and they were not complete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In 1888, Liao Ping was divided into“Refutation of Liu Xin” and“Recognizing the Sage” from the examination of continuing Modern and Ancient Studie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ression of antiquity and knowing sage. Since 1890, Kang Youwei has followed his work“Forged Classics of the New Learning” and“Confucius as a Reforme”, and it is the inevitable premise of respecting Confucius to prove the falsehood. This form of writ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is the only aspect in which Liao and Kang completely agre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academic case” can be settled.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Kang’s plagiarism exists, they completely different systems of modern and ancient studies, and the inner division of the ideological circ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n also be seen.

Keywords: Liao Ping, Kang Youwei, Guangzhou meeting, respecting the modern classical text and oppose the ancient classical text,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